两则历史典故的解读与启示
晏子治阿及齐威王烹阿大夫

■ 朱明华

春秋战国时期，东阿（亦称阿或阿邑，治在今阳谷县阿城镇）作为齐国西陲的军事重镇，地处齐赵边境，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检验执政者能力的试金石。围绕东阿治理，史书留下了两则迥然不同的典故，它们深刻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态中的治理智慧与警示意义。

晏子治阿——清正务实与形式主义的博弈

晏子，即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宰相，早年曾担任东阿大夫。晏子初到东阿任职时，秉持清廉务实的作风，心系百姓、体恤民情，使得当地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正是因为他治理东阿时公正无私、不徇私情，触动了一些权贵的利益，所以遭到这些人的诋毁，齐景公甚至险些将他免职。

汉代刘向所著《说苑·理政篇》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书中写道，晏子治理东阿三年后，齐景公将他召回并责备道：“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于子。”齐景公责怪晏子没有治理好东阿，并要追究他的责任。面对君主的责备，晏子没有急于辩解，而是请求道：“臣请改道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齐景公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

次年，晏子改变了治理策略，他对权贵的贪腐行为放任不管，还加重了百姓的赋税，百姓半数陷入饥馑。然而，这看似“乱政”的做法却得到了齐景公的高度赞扬。到了第二年“上计”时（相当于年终统计考核），景公亲自迎接晏子并祝贺他说：“你把东阿治理得太好了！”

晏子于是向景公直言其中的真相：“我从前治理东阿时，不接受私人请托，不收受财物贿赂；水泽池塘里的鱼，都让贫苦百姓受益。那时百姓没有挨饿的情况，可国君您却怪罪我。如今我治理东阿，听从私人请托，接受财物贿赂，加倍征收赋税，少交国库；原来水泽池塘里的鱼用于百姓生计，现在尽数落入权贵之家。现在挨饿的百姓超过半数，国君您反而迎接我、祝贺我。”由此可见，晏子“改道易行”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借机揭露考核制度的弊端。景公听后，深感惭愧，感叹道：“东阿的政务，就全权托付给你了，我不再过问。”

据《晏子春秋·晏子再治阿而见信景公任以国政》记载，齐景公从晏子治理东阿中认识到晏子的贤能，后来便将国政托付于他。三年后，齐国国力日益强盛，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齐威王烹阿大夫——明察赏罚与吏治整饬的典范

战国中期，齐威王即位之后，为肃清吏治，暗中派人对在朝廷中声誉极佳的东阿邑和饱受朝臣诋毁的即墨邑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却与传言截然相反。

据《资治通鉴》记载，周烈王六年（公元前370年），齐威王派人考察了即墨与东阿后，便分别召见了即墨大夫与阿大夫。他对即墨大夫说：“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说罢，当即封赏即墨大夫万户食邑。随后，齐威王又对阿大夫说：“自子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馁。昔日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当天，齐威王就下令：“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

其大意是，齐威王时期，经常有人诋毁即墨大夫，却有很多人称赞阿大夫。齐威王便派人前往两地实地考察。考察发现，即墨田地得到开垦，百姓生活富足，政务处理有序，东方地区安宁稳定。之所以对他有诋毁之言，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讨好朝臣。反观东阿，田地荒芜，百姓生活贫苦。此前赵国攻打鄄城、卫国占领薛陵，东阿大夫既不救援也不知情，并且还通过贿赂朝臣来获取虚假的赞誉。于是，威王赏赐给即墨大夫万户食邑，烹杀了阿大夫以及替他美言的近臣。

齐威王的这一重要举措在朝堂上下引起巨大震动，深刻影响了齐国的政治生态，使其走上大治之路。史书记载：“于是群臣竦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大臣们不敢再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而是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在这样良好的政治氛围下，齐国的政务得到有效治理，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最终“强于天下”。

典故对比与启示

晏子治理东阿时，前后不同的做法在齐景公那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治理东阿的头三年，晏子坚守廉洁奉公的原则，既不接受私人请托，也不收受他人贿赂，一心一意为贫苦百姓谋福利。然而，齐景公却认为他把东阿治理得混乱不堪。为了解答景公的质疑，到了第四年，晏子改变了治理策略，纵容贪腐现象，在政务处理上也变得懈怠懒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景公反而对他予以表扬。这一典故不仅彰显了晏子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更暴露了君主偏听偏信，以及考核流于形式的严重问题。勤政为民的官员反倒遭到贬斥，这无疑是古代吏治评价体系的一大弊病。

与齐景公不同，齐威王在听闻身边人对即墨大夫诋毁不断及对东阿大夫赞誉不断后，并未偏听偏信，而是秉持眼见为实的原则，派人到两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发现，即墨的荒地已然变为良田，百姓生活富足，政务处理及时、没有积压。原来，是因为即墨大夫没有讨好威王身边的权臣。而东阿邑却是另一番景象，田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面对外患也毫无作为。究其原因，是东阿大夫贿赂朝中近臣，让他们为自己说好话。齐威王并未被身边近臣的毁誉之言迷惑，他以实地考察代替道听途说，以事实政绩摒弃阿谀奉承，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评判，充分彰显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执政智慧与整饬吏治的决心。即墨大夫实干为民，虽遭诋毁，仍获应有奖赏；东阿大夫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即便有虚假赞誉，也难辞其咎。

前后两位东阿大夫，一位治理东阿时心系百姓、公正无私，不仅治理有方，还清正廉洁，最终得到提拔重用，成为名垂青史的贤相；另一位则欺上瞒下、贪腐渎职，弄虚作假、不干实事，致使治下民不聊生，最终遭到严厉惩处，落得个被烹杀的下场。由此可见，施政理念与行事作风不同，人生结局也大相径庭。两则典故虽都涉及东阿，但背后所反映的政治生态和治理逻辑却有着天壤之别，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治理启示。

其一，为政之本在于赢得民心，考核之基在于考察实绩。晏子和即墨大夫皆以民生为根本，轻视虚名而注重实效，最终在青史留下美名；而阿大夫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纵然一时获得赞誉，最终仍身败名裂。

其二，监督机制必须健全，评价体系贵在客观。齐景公偏信谗言，险些埋没贤才；齐威王则通过暗访核查，得以去伪存真。二者的鲜明对比警示我们，政绩考核必须深入基层、广泛倾听民众声音；考核结果必须客观真实，切忌流于形式。

其三，赏罚分明能够树立正气，严惩贪腐可以以儆效尤。晏子凭借德才受到重用，齐国因此走向兴盛；齐威王烹杀渎职官员，吏治因此得以肃清。唯有建立“能者上、庸者下、贪者惩”的刚性制度，才能构建起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当代治理的借鉴意义

从晏子治理东阿时展现的勤政爱民、革新除弊，到齐威王怒烹阿大夫所彰显的整饬吏治、赏罚分明，似一面明镜，清晰映照着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与治国之策。春秋战国时期这段跨越千年的东阿往事，从正反两个维度，折射出执政为民与严明法度的永恒价值，这不仅为古代地方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即便在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在新的时代，更应该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深刻认识权力来自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一切决策和行动，都应以满足人民需求、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深入基层，倾听民众呼声，了解实际诉求，以切实可行的举措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

第二，要力戒形式主义。必须坚决摒弃“只唯上、不唯实”的官僚作风，树立“实绩导向”，脚踏实地解决民生实际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攻克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要严格遵守纪律规范，始终坚守正义正道，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日常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要强化监督问责。必须构建多维考核机制，增强政绩考核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考核不仅要听汇报、看材料，更要考察实际成效，注重倾听百姓声音。对于真抓实干、成绩显著的干部，要给予表彰与重用；对于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惩处。

第四，要坚守廉政底线。清正廉洁是永恒的主题，广大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廉洁自律，筑牢廉政底线。一方面，要加大廉政教育力度，强化干部的廉洁意识；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以及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保持反腐高压态势。通过这些措施，涵养崇廉尚实的政治生态，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东阿的两则典故一正一反，既是古代吏治的缩影，更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清晰的镜鉴，深刻揭示了“民心即政绩”这一永恒真理。其中所蕴含的“务实为民”的治理基因，正是实现政治清明、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唯有传承这一宝贵的治理基因，以史为鉴、务实革新，我们才能跳出“晏子困局”，实现“威王之治”。

张岱的历史观

■ 罗衍军

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张岱（1597年—1680年），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为“浙东四大史家”，《石匮书》《石匮书后集》是体现张岱史学观念的代表性著作。《石匮书》220卷，又名《石匮藏书》，为张岱利用家藏资料所撰写的纪传体明史，“发端自至正末季，备考其甲坼勾萌；断简至天启七年，余俟其事久论定”。《石匮书后集》计63卷，记载了崇祯朝及南明史事变迁。张岱为撰写《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历时凡30余年。撰史之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张岱以顽强的毅力，完成这一皇皇巨著，后人称之为《明史记》。因成书时，明朝已亡，故名为《石匮藏书》，以示忠于前朝之意。张岱具有治史的家学传承和浓厚的学术根基，其身处明亡清兴的大转折时代，家国兴亡的经历在其史学撰述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史学观念无疑彰显了历史变革和自身经历的鲜明特色。

推崇君明臣贤的治国模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本意识

张岱对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从民族意识出发，指出朱元璋反抗元朝统治、建立明朝的功绩远超商汤、周武、汉高祖，可为万世之功，“汉高帝之功，一世功也；高皇帝之功，万世功也”。明成祖朱棣作为一个以下犯上、倡乱弑君与雄才韬略的有为之君二者兼具的君主，对其作为，张岱主张要辩证看待。一方面，不能完全遮蔽其不符合正统君王之道的行为，故对坚决拥护建文帝的臣子给予充分的肯定，赞扬他们的忠君行为。另一方面，又对朱棣的行为予以回护，认为不能以“拘挛之行”评价“上圣之主”，对做出巨大功绩的一代雄主明成祖来说，应将其历史功绩放在主要位置，“夫拘挛之行，岂所以论上圣之主哉？成祖居权，以唐太宗自拟，有唐家法则，非我俦。盖汤武耶，盖汤武耶”。对明孝宗以仁孝治国，君明臣良、勠力同心，形成盛世局面的模范治国秩序，张岱给予高度赞许。对不应朱元璋之征召、饮鸩而亡的元朝遗臣，张岱同样给予相当肯定。

在张岱看来，君明臣贤的关键在于统治政权的君主执政之明，实行合乎历史发展的政策。因之，臣子择主便非常重要，“有死主之勇，须先有择主之明。苟死托身非人，不能见几，复为死难，则是蔡邕之哭董卓，扬雄之死王莽，徒资万世笑骂耳，何义之与有？”

批判明朝中后期统治之弊，提出明之衰亡始于万历末季、实亡于天启的观点

张岱敏锐地指出，在明中期的明武宗时期，国家局势已是危机萌生，隐患迭起，这乃是由于武宗耽于享乐、荒于政务所造成的：“流连荒亡，恣意游佃，万乘之躯，等于一掷，其不致颠覆社稷者亦幸矣！”明神宗长期荒于国政，重用宦官，致使明后期国是日非，张岱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盖我明之亡徵，已见之万历末季矣”。

在张岱看来，奸佞之臣，历朝皆有，其关键即在于为帝者能否知人善用，亲贤臣、远小人，自设防维，如君主用人不明，则可能造成“鱼肉天下，倾覆国家”的下场，“千古之巨怼大恶，皆千古之明君察相以为不足重轻而奴隶蓄之者也。嘤茂一窃，用以鱼肉天下，倾覆国家，止在其咄嗟顾盼间，而有余矣”。

多方面剖析明思宗朱由检亡国因由，指出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岱从过于节俭、边患丛生、朝令夕改、君臣离心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造成崇祯亡国的因素，既对崇祯的气节与勤政给予充分肯定，又对其性格的内在缺陷予以深刻批判，“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对崇祯的节省，张岱给予一定认同，但同时指出崇祯的节俭过度、不知变通，导致军士无饷、边患四起，而人无资财，财尽归于勋臣戚畹、内珰，矛盾日积，危机四伏。因之，要做到“拨乱反正之主”，则必须“倜傥轻财”。

对崇祯用人，张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崇祯帝虽焦于求治、渴于用人，但其朝令夕改、用人多疑、刻薄寡恩、杀人太骤，以致君臣离心，群臣多以崇祯之是非为是非，至国事危难之时则人心涣散，竟无一人为崇祯分忧宣力。《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崇祯评价云：“尽管朱由检后来成了一个比许多年来任何一个皇帝远为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这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促成他的王朝的覆灭。无论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么，朱由检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统治者。”作为与崇祯同时代的张岱，在明朝覆亡时刻即能得出与《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论相同的认识，可见其史观之深刻与敏锐。

张岱一方面对崇祯帝的为政之失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另一方面则充分肯定了崇祯的气节与勤政，称之为“失天下之正”，“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已”，明朝在崇祯帝时期败亡，乃是“天道至以颠倒极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将南明政权仅列为世家，而不列为本纪，这正是缘于张岱对崇祯气节与勤政的认同和对南明诸统治者腐化、无能的强烈批判。“古今得天下之正，无过吾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无过吾烈皇帝。于烁皇明千秋万祀为不可几及也已”；“实是中兴之令主，反为亡国之孱王。天道至以颠倒极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万姓悲思。汉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万一者也。余故于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历仅列世家，不入本纪，此则痛思先帝，真同鹃泣”。

清初名士戴名世对明朝中后期的党争深恶痛绝，他认为党争之祸比明末农民起义还要厉害：“此其罪甚于盗贼万万。”而早在戴名世是论之前数十年，张岱即有与其基本相同的认识，他认为明朝中后期臣属的结党营私、各谋私利是导致时局败坏、朝代更易的重要缘由，他对明末东林党恶性发展所造成的朋党之祸深恶痛绝，严厉抨击东林党将个人恩怨和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时局之上的做法。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阐述了对东林党“朋党之祸”的看法，“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今乃当东林败国亡家之后，流毒昭然，犹欲使作史者曲笔拗笔，此某所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同时，他以明末农民起义军兴起时，下层官员蒙瞒不报，造成国家危局不可收拾为例，阐明明末官吏对下欺压、对上蒙蔽所造成的恶果，“圣君在上，残贼横行，至截一县之手而蔽不以闻，则天下事，更孰有大于此者乎”。

深刻分析南明政权抗清失败的内在缘由

张岱指出，本应挽救明朝危亡局势的南明诸王，却或奢侈腐化、荒淫无度，或志得意满、只图身享旦夕之乐，或唯事奔逃，或识人不明，或臣属陷于内争，难以负起挽救危亡、抵御外敌的艰巨使命。因之，南明政权的覆亡便具有了其必然性，“余故以五王之事迹，仍散见于各藩之世家，而若夫成败之始末，迁播之方隅，羁縻之岁月，拥戴之臣工，则未之详也，为作明末五王世家”。当然，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张岱在撰写南明历史时，对其后期局势的变动状况，掌握得并不是很清楚，因此对桂王朱由榔和鲁王朱以海事迹的描述皆中途而止，没有明确的交代。

张岱对南明政权内部的钩心斗角深恶痛绝，他曾上书鲁王朱以海，要求诛杀弄权内斗的弘光朝首辅大臣马士英。对尽心辅佐南明政权、以身殉国的苏观生、瞿式耜，张岱则赞其才略忠勇，而叹息时势之溃烂，忠臣义士虽有补天之才而无用武之地。

如实描述明末臣民英勇抵抗清军入侵、舍身殉国的忠贞气节，于历史书写中贯穿鲜明的民族意识

对明清鼎革之际清军对抗清臣民和广大无辜民众的杀戮，作为故国遗民的张岱深为痛恨，他将强烈的民族意识隐伏于心底，凝聚于笔端，赞扬广大民众宁死不屈的抗清义举。如描述清军攻陷定海时民众以身殉难的情形，“百姓皆忠义，无一室不自焚，或持槊于道，清曰弃槊活汝，必迎刃冲数武，自尽死，余不及尽数”。他对念念忠于明朝、以身殉国的祁彪佳、刘宗周深表认同：“余生平慕文山、叠山之为人，而恨不得与之同世，乃日对二君子而不知，文山、叠山之日在吾侧也。岂不陋哉？”

在张岱对太子朱慈烺事迹的描述中，亦隐含对太子不屈行为的认同，对清政府暴行的抨击：“况吾太子，见贼不屈，自堪与北地争烈，而猥使一载，子婴衔璧道左，乃可为昭烈之后，其皆刘禅哉？”对投降清军，并积极镇压南明人民抗清斗争的贰臣，张岱则集抨击于叙述之中，如他对向清政府献薙发之策的孙之獬事迹的描述，便体现了这一点，“之獬仕卤，为江西招抚时，江南尚未薙发，之獬言满汉异制，则心不归一，即行天下，逼勒薙发。山东民变，缚之獬父子于麓谯斋割之”。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历史书写对农民起义的丑化态度，以较为客观的笔触描述明末农民起义事迹

张岱在叙述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史迹时，能够以相对客观的笔触加以描述，他虽然仍将农民军视为“贼寇”，但在描述中能以客观态度呈现其事迹，如描述农民军在行军中军令严明、秋毫无犯，得到民众拥护，而明军则师无纪律、纵兵抢掠，以致民不堪命的情况，“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蕃民垦，田牧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他如实呈现起义军的声威，“大旗一动，势如排山倒海……居民望风迎附”。显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一位满腹才华、命运动荡漂泊的变世历史学家，张岱对明朝中后期帝王的荒怠腐化、举措乖张及臣属的结党营私、残民以逞大加批判，指出明朝的灭亡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他呼唤君臣合力，实行兴国利民之举措，这无疑符合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规律。